

# 试论 1885—1887 年英土关于 埃及问题的两次谈判

赵 军 秀

**内容提要** 英国和土耳其关于埃及问题的两次谈判<sup>1</sup> 是 1885 年英俄中亚危机后英国外交政策的一次调整。英首相罗伯特·索尔兹伯里试图从解决埃及问题入手,缓和同土耳其和法国的矛盾,摆脱自己在欧洲的外交孤立。两次谈判英国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对英国中近东政策和 19 世纪晚期的欧洲同盟政治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索尔兹伯里 埃及 土耳其海峡 沃尔夫使命

1885—1887 年,英国首相罗伯特·索尔兹伯里两次派 H. D. 沃尔夫作为特使赴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进行谈判。谈判的议题主要围绕埃及问题,但谈判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埃及问题本身。它是英国政府在 1885 年英俄中亚危机后外交政策的一次调整,英国试图从解决埃及问题入手,缓和同土耳其及法国的矛盾,摆脱自己在欧洲的外交孤立,以利于在近东和土耳其海峡地区扼制俄国。但索尔兹伯里并不打算放弃埃及,原则上许诺从埃及撤退的同时,又提出撤离的种种前提条件,从而使撤离遥遥无期。英土两次谈判虽然不了了之,埃及问题却进一步与海峡问题联系起来,成为英国中近东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目前,尚未见到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虽然涉及到沃尔夫两次使命,但对 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中近东的总战略研究不够,对英国的“欧洲均势”政策和“帝国防御”战略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论述也还欠缺。笔者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英土关于埃及问题的两次谈判置于英国中近东总战略的框架下进行探讨和分析,重点分析英国的埃及政策与其海峡政策、欧洲均势政策之间的内在关系,并试图揭示和阐明两次谈判的结果对于英国 1887 年与奥匈和意大利签订地中海协定、在欧洲采取有限合作政策的影响。

## 一、英土埃及问题谈判的提出和由来

1885 年英国在欧洲面临的外交孤立是英土埃及问题谈判的直接背景。要理解英国政府把解决埃及问题同摆脱孤立直接联系起来,需要对英国的埃及政策及其对欧洲国际关系的影响作一简略回顾。

---

<sup>1</sup> 本研究课题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埃及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汇处,濒临地中海沿岸,在英国中近东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从 19 世纪 30、40 年代起,英国一直通过坚持土耳其拥有对埃及主权的政策打击法国。在 1832—1833 年和 1838—1839 年两次土埃战争中,英国支持土耳其,并通过签订 1840 年英埃协定,将埃及帕夏默罕默德·阿里驱逐出叙利亚等地,遏制了阿里建立大阿拉伯帝国的野心,迫使埃及承认同土耳其的隶属关系,同时也使法国长期以来支持埃及独立于土耳其、从而控制埃及的政策受挫。此后,英法虽然能够在近东问题上联合抗俄,并在 1853—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结成同盟,但两国对埃及的争夺从未停止。两国的争夺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19 世纪 40 至 60 年代,英国反对法国政府幕后支持下的莱塞普运河公司修建苏伊士运河的计划。英国认为,运河计划是法国的“政治阴谋”,是变相支持埃及独立,“运河完成之日,就是埃及完全脱离土耳其、置于法国保护下之时”<sup>1</sup>。因此,英国运用各种途径和方式阻挠运河动工。1859 年运河动工后,当英国看到运河开凿的既成事实无法改变时,逐渐向“先成之,后夺之”的政策转变。

第二,1875 年英国购买苏伊士运河股票。随着 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英国对运河的关注日益增强。一方面,运河使欧洲到印度的航路缩短了 6000 英里,逐渐代替好望角,成为英国与其东方帝国联系的主要航道;另一方面,英国是运河开通以后的最大获利者。仅就通航的最初两年看,英国船只占通过运河商船总数的 75%<sup>④</sup>。由于英国海外贸易的命运与运河息息相关,1875 年,在埃及财政破产的情况下,英国及时购买了埃及政府手中的苏伊士运河股票,由此拥有了运河公司 44% 的股票,成为运河公司最大的股东。对于购买运河股票的意图,当时的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坦露:“购股不是财政投资,而是政治交易,意在加强帝国力量。”<sup>④</sup>对此,英国泰晤士报评论道:“不可能把我们购买苏伊士运河股票的想法与未来的英埃关系割裂开。”<sup>1/4</sup> 法国舆论界更是认为:“这件事不等于英国对埃及的占领,但却是占领的开端。”<sup>1/2</sup>

第三,1876 年英国与法国合作,对埃及财政实行“双重控制”政策。英法两国对埃及的共管恰值 1875—1878 年近东危机之时,体现了英法埃及之争从属于英俄海峡之争的特点。此间虽然德国出于打击法国的目的,一再唆使英国占领埃及,却都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1881 年,索尔兹伯里对英法共管埃及曾这样解释:“当你和你的盟友(指法国——笔者注)共同对一个地区感兴趣的时候,你有三种选择:放弃、独占和共管。放弃意味着让法国人挡住我们通往印度之路;独占非常接近冒战争的危险;所以我们选择共管。”<sup>1/4</sup> 纳忠先生也曾深刻地指出:“两国表面上的合作,并不能掩饰其斗争的尖锐化,它们都准备着把埃及划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而且都准备以武力干涉埃及。”<sup>⑧</sup>共管可看作是英国占领埃及的第二步。

<sup>1</sup> 约翰·马洛:《苏伊士运河的完工》(John Marlowe, *The Making of the Suez Canal*), 伦敦 1964 年版,第 85 页。

<sup>④</sup> H. L. 霍金斯:《英国通向印度之路》(H. L. Hoskins, *British Routes to India*), 纽约 1966 年版,第 372 页。

<sup>④</sup> 埃尔-马格拉黑:《英国对埃及的政策, 1875—1885》(El-Magrahi, “British Policy toward Egypt 1875—1885”), 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 1982 年,第 30 页。

<sup>1/4</sup> 阿斯拜尔:《1885—1892 年索尔兹伯里统治时期的英埃关系》(Al-Subaiy,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under Lord Salisbury”), 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 1980 年,第 10 页。

<sup>1/2</sup> 杨灏成:《埃及近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7 页。

<sup>1/4</sup>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罗伯特·索尔兹伯里勋爵传记》(索尔兹伯里书信集)(Layd Gwendolen Ceci, *Life of Robert of Marquis of Salisbury*), 伦敦 1921 年版,第 311—312 页。

<sup>⑧</sup> 纳忠:《埃及近现代简史》,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30 页。

第四, 1882 年英国占领埃及和运河。当然, 英国政府不承认是占领, 强调仅仅是“干涉”和恢复埃及的秩序。对于英国占领埃及的原因, 史家众说纷纭。一是战略派的观点, 认为埃及的战略地位是英国占领埃及的决定性因素。罗纳德·鲁滨逊和约翰·加拉格尔的《维多利亚与非洲》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他们认为, 英帝国的力量“取决于拥有印度以及对东方的影响, 这种影响几乎与英国本土的重要性相等”, “到东方航路的安全, 英国内阁不敢赌博”<sup>1</sup>。二是经济派的观点, 强调英国在埃及的经济利益以及苏伊士运河对英国海外贸易的重要影响, 促使政府最后做出占领埃及的决定。A. G. 霍布津斯在《维多利亚与非洲, 对 1882 年占领埃及的重新评价》一文中列举了大量数字论证这一观点。该文指出, 1880 年埃及商品的 80% 出口到英国, 而进口商品 40% 来自英国。在通过运河的商船中, 英国船只占 80%, 法国占 6%<sup>④</sup>。英国对这样巨大的经济利益不可能熟视无睹。三是殖民扩张派的观点, 除了与经济派观点有类似之处外, 还认为英国占领埃及是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欧洲列强掀起殖民扩张狂潮的必然趋势。由于英国担心埃及成为法国的“第二个突尼斯”, 因此以占领埃及平衡法国占领突尼斯。而“法国对英国干涉埃及的愤恨, 导致非洲进一步被瓜分”<sup>(四)</sup>。

笔者认为, 英国占领埃及有着复杂和综合的因素, 其中战略、经济和殖民扩张的考虑又是不可分割的。经济往往是动机, 而战略和殖民扩张则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英国所以不遗余力地保卫通往印度之路的畅通, 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经济利益。根据 S. B. 索尔在《1870—1914 年英国海外贸易研究》一书提供的数字, 1830 年以后, 英国棉纺织品向印度的出口迅速增长, 到 19 世纪晚期, 英国棉纺织品的 50% 以上运往印度, 印度成为英国棉纺织品最主要的消费者。另外, 运河不仅联结英印帝国, 还成为英国与中国、东方, 乃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整个庞大经济帝国沟通的重要纽带。英国对外贸易的 84% 与运河关联, 这是英国不容忽视的利益<sup>1/4</sup>。

笔者不打算对英国占领埃及的原因一一进行评论, 本文强调的是: 无论英国占领埃及的动因是什么, 占领的事实对英国在欧洲的处境以及与欧洲大国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 英国占领埃及以后, 于 1883 年 1 月结束了英法对埃及的共管, 从而激化了英法矛盾。在埃及, 法国文化的影响历史悠久, 法语成为阿拉伯语外的主要语言。另外, 法国也同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利益, 埃及出口商品的 10% 运往法国, 进口商品的 11% 来自法国, 与英国相比虽然相差甚远, 但仅次于英国, 居第二位<sup>1/2</sup>。因此法国认为, 英国占领埃及是 1870 年普法战争“色当惨败以来所遭受的最大耻辱”<sup>3/4</sup>。法国的目标是回到双重控制时期, 前提是英国从埃及撤军。其次, 英国占领埃及, 导致英土关系紧张。1883 年 9 月, 英国派官员去埃及任代理人。尽管英国向土耳其表白: “我们没有统治埃及, 仅仅统治埃及的统治者”<sup>⑧</sup>, 但土耳其认为这是削弱其主

<sup>1</sup> 罗纳德·鲁滨逊、约翰·加拉格尔:《非洲与维多利亚》(Ronald Robinson and John Gallagher,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伦敦 1963 年版, 第 159 页。

<sup>④</sup> A. G. 霍布津斯:《维多利亚和非洲, 1882 年占领埃及的重新评价》(A. G. Hopkins, “The Victorians and Africa: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Occupation of Egypt, 1882”), 《非洲历史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27 卷, 1986 年第 2 期, 第 379 页。

<sup>(四)</sup> A. G. 霍布津斯:《维多利亚和非洲, 1882 年占领埃及的重新评价》, 《非洲历史杂志》27 卷, 1986 年第 2 期, 第 368 页。

<sup>1/4</sup> S. B. 索尔:《1870—1914 年英国海外贸易研究》(S. B. Saul, *Studies in British Overseas Trade, 1870—1914*), 利物浦 1960 年版, 第 188 页。

<sup>1/2</sup> 阿斯拜尔:《1885—1892 年索尔兹伯里统治时期的英埃关系》(博士论文), 第 36 页。

<sup>3/4</sup> 杨灏成:《埃及近代史》, 第 231 页。

<sup>⑧</sup> 阿斯拜尔:《1885—1892 年索尔兹伯里统治时期的英埃关系》(博士论文), 第 35 页。

权、肢解奥斯曼帝国的行为。此后,土耳其一直在与英国交涉埃及问题,并与法国共同对英施加压力,要求英国明确宣布撤离埃及的日期。由于埃及问题的介蒂,土耳其对英国日益疏远,英土传统的友好关系裂痕加大。第三,英法在埃及问题上的敌意,便利了欧洲其他国家向英国施压、与英国讨价还价,特别成为德国要挟英国的工具和筹码。俾斯麦甚至将埃及与德国的殖民计划联系起来,他大肆宣传,德国若在“埃及问题上帮助英国,要求在其他地方得到回报”<sup>1</sup>。总之,英国占领埃及以后,“土耳其已不再是英国可依靠的同盟”。英国“原有的敌意依然存在,原有的友谊却不见了”<sup>④</sup>。因此,当 1885 年 3 月俄国侵入阿富汗平狄,英俄在中亚武装对峙发生平狄危机后,英国陷入极度的外交孤立。特别是德国,不仅自己支持俄国,还动员奥、意、法等国,坚持土耳其海峡必须对英国战舰关闭,这对于英国是致命的打击。在英国看来,德国和他的同盟支持俄国反对英国,而土耳其屈从于德国与欧洲列强,英国战舰进入黑海阻击俄国的行动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没有欧洲大陆国家的支持,无论从外交还是从武力上,英国都不能在中亚和近东挫败俄国。在这种形势下,英国迫切需要寻找摆脱孤立的突破口,由此产生了 1885 年 8 月沃尔夫赴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就埃及问题进行谈判的使命。可以说,在解决英俄中亚危机的过程中,英土埃及问题谈判应运而生。

## 二、两次埃及问题谈判的目的及结局

笔者从索尔兹伯里书信集及相关资料中看到,沃尔夫赴君士坦丁堡之前,索尔兹伯里曾在 1885 年 8 月 7 日、13 日、19 日三次写信给沃尔夫。笔者认为,这三封信可看作是索尔兹伯里对沃尔夫土耳其之行的指示,概括起来有三点:第一,原则性的指示,让沃尔夫尽最大努力保卫英帝国的整体利益。索尔兹伯里在 8 月 7 日的信中向沃尔夫指出:首先要做的,“以尽可能的努力,维护这个国家的帝国利益”<sup>④</sup>。第二,指示沃尔夫进行外交上的讨价还价。在 8 月 13 日的信中,索尔兹伯里提出:我们谈撤离埃及问题,“但要为英国保留明确的权利”,例如“占领亚力山大或者其他一两件事情的权利。……这些条件看起来难以获得,但直到欧洲国家的态度明朗以前,我们不能放弃”,索尔兹伯里又说:“由于这些原因,目前还不到确定我们撤离日期的这一步。”<sup>1/4</sup>第三,明确告诉沃尔夫英国在埃及问题上的最后底牌。8 月 19 日,索尔兹伯里向沃尔夫阐明:“我坚决反对确定撤离埃及的日期。”<sup>1/2</sup>

从索尔兹伯里上述指示中还可以看出,埃及问题虽是沃尔夫使命的直接议题,英国政府却没有真正解决的诚意,只是在做一种姿态。笔者认为,索尔兹伯里这样安排,是既想观察欧洲大国对英国此举的反映,又想制造一种假象取悦土耳其,以便使土耳其与英国和解,重新修好。其实,沃尔夫使命的潜在意图是极为明显的。索尔兹伯里强调:“外交是一个讨价还价的问题

<sup>1</sup> D. C. 威克斯:《1885—1887 年英国外交政策中的埃及问题》(David C. Weeks, “The Egyptian Question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1885-1887”)(博士论文),1952 年,第 66 页。

<sup>④</sup> 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书信集》第 3 卷,第 219 页。

<sup>④</sup> 阿斯拜尔:《1885—1892 年索尔兹伯里统治时期的英埃关系》(博士论文),第 38 页。

<sup>1/4</sup> 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书信集》第 3 卷,第 219 页。

<sup>1/2</sup> C. J. 洛:《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C. J. Lowe,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78-1902*)第 2 卷,伦敦 1967 年版,第 95 页。

题”，他还要求沃尔夫为英国“保留其他一两件事的权利”，充分反映了沃尔夫使命是实现英国外交目的的一种手段。遗憾的是，笔者在所看到的外交文件及档案中，虽然发现了英国试图通过与土耳其谈判“为广泛的政治安排铺垫基础”的意图<sup>1</sup>，却没有看到索尔兹伯里明确提出“讨价还价”的具体内容。但根据索尔兹伯里给沃尔夫的指示以及当时欧洲形势和英国面临的处境，却不难作出分析和判断，英国政府想通过沃尔夫使命起到一箭多雕的作用。

第一，消除土耳其的敌意，并以此获得土耳其在海峡问题上满足英国要求的承诺。C. J. 洛在《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一书中分析：“由于当时英俄在中亚的对峙，英国提出撤离埃及，为的是与土耳其达成一项交易：一旦英国与俄国交战，土耳其允许英国战舰通过海峡，以此作为对英国撤离埃及的回报”<sup>④</sup>。笔者在《1885—1887年英国外交政策中的埃及问题》（博士论文）一文中也发现相同的论述，该文写道：“英国需要就海峡问题与土耳其达成协定，这样一个协定是对英国撤离埃及合适的回报。”<sup>⑤</sup>因此笔者认为，所谓外交上的讨价还价，英国要的价主要是对英国战舰开放土耳其海峡。英国谈埃及问题，意在为英国获取能够遏制俄国的手段和途径。

第二，改善同法国的关系，摆脱英国在地中海的困境。如前面分析，英国占领开罗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大，与法国的关系也就越紧张。由于法国对英国的敌意与俄国对海峡及君士坦丁堡的威胁同时存在，从而导致英国在地中海处于一种僵局。如果英国提出解决埃及问题，明显可以缓解英法的矛盾。但英国直到确信土耳其能够坚守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抵抗俄国时，又不能轻言撤离埃及的确切时间。这也反映了索尔兹伯里策划沃尔夫使命时的良苦用心。他一方面告诉沃尔夫：“法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离我们那么远”，另一方面又说：“我们要尽可能保持同法国的友谊，同时又不付出昂贵的代价。”<sup>⑥</sup>

第三，使德国失去以埃及为工具要挟英国的机会。笔者认为，英国缓解与法国和土耳其关系意在阻止德国利用法国反对英国、使英国逐渐走出外交孤立的深渊。这一意图在索尔兹伯里的外交信件中也是十分清楚的。他在给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怀特的信中说：“通过法国的行动来制造埃及骚乱的威胁，是俾斯麦反对我们的仅有的武器……我们必须钝化它。”<sup>⑦</sup>由此可见，索尔兹伯里想努力摆脱英国在埃及问题上的困境，并以他特有的方式重新恢复和建立英国在欧洲大国中的地位。

第四，索尔兹伯里对沃尔夫的指示实质上是加强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而不是削弱占领。他反复阐释：“我们的外交任务是双重的，一是对我们在埃及作出合适的安排，二是若我们离开埃及，对我们占领埃及付出的人力、物力给予补偿……我们必须避免任何确定和随意撤离的承诺。”<sup>⑧</sup>这些阐释表明，对于英国来说，放弃埃及是不可想象的，除非欧洲国家对英国做出巨大的让步。正是英国中东政策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决定了英国绝不会简单地放弃埃及。

沃尔夫于8月22日到达君士坦丁堡，他遵循索尔兹伯里的指示，避免涉及从埃及撤退的

<sup>1</sup> B. 杰拉维奇：《奥斯曼帝国、列强与海峡问题，1870—1887》（B. Jelavich, *The Ottoman Empire,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Straits Question, 1870 - 1887*），布卢明顿 1973 年版，第 148 页。

<sup>④</sup> C. J. 洛：《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第 2 卷，第 96—97 页。

<sup>⑤</sup> 威克斯：《1885—1887 年英国外交政策中的埃及问题》（博士论文），第 54 页。

<sup>⑥</sup> 阿斯拜尔：《1885—1892 年索尔兹伯里统治时期的英埃关系》（博士论文），第 37 页。

<sup>⑦</sup> 阿斯拜尔：《1885—1892 年索尔兹伯里统治时期的英埃关系》（博士论文），第 37 页。

<sup>⑧</sup> 阿斯拜尔：《1885—1892 年索尔兹伯里统治时期的英埃关系》（博士论文），第 38 页。

时间,拒绝土耳其苏丹关于英国确定撤退日期的要求。沃尔夫还危言耸听地告诉土耳其政府:“如果英国离开埃及,其他欧洲国家将取代英国”,“土耳其将进一步分裂,运河将落入其他大国手中”<sup>1</sup>。沃尔夫在君士坦丁堡逗留期间,索尔兹伯里再次通知他:“女王对任何确定撤退日期的承诺都十分担忧。”由于英国不肯确定从埃及撤退的日期,双方在两个多月的商谈之后,于 10 月 24 日仅达成这样一项协定:“英土双方派出高级官员到埃及,研究埃及的状况并向各自政府报告,然后再决定如何解决埃及问题。一旦确信埃及的秩序有保证,再考虑英国军队从埃及撤军的问题。此协定向双方政府报告后,15 天内生效。”<sup>④</sup>

不言而喻,沃尔夫的君士坦丁堡之行引起了欧洲大国的密切关注。欧洲各国认为,沃尔夫使命的要害是其外交的秘密性质,关键在于英国政府要与土耳其单独缔结条约,即便没有什么结果的英土协定也被欧洲各国认为对英国极其有利。他们断定:土耳其同意委派英国高级官员到埃及,实际意味着土耳其官方对英国占领埃及的承认。因此各国对英土协定的批准采取了敌视、阻挠和破坏的态度。

法国认为,英国试图寻求与土耳其单独就埃及问题缔结协定,而把法国排斥在外,因此极力反对沃尔夫使命,并希望其失败。俾斯麦怀疑沃尔夫负有与土耳其缔结反俄协定的秘密使命,表示:“德国决不能破坏与俄国的关系,不可能支持任何反对俄国的计划。”<sup>⑤</sup>俄国报刊舆论界也认为沃尔夫负有与土耳其结盟的使命,极力进行谴责并预言其必将失败。俄国政府还向土耳其发出警告:如果土耳其苏丹与英国缔结类似像 1878 年《塞浦路斯协定》那样的条约,俄国决不能漠然处之。英国驻德国大使马利特深刻地指出欧洲各国关注沃尔夫使命的实质,他说:“比起埃及问题本身,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可能对本国与他国关系的影响。”<sup>⅜</sup>由于欧洲各大国的外交攻势,也因 1886 年初格拉斯通取代索尔兹伯里任首相后忙于处理爱尔兰事务,第一次埃及问题谈判无疾而终。但英国并未放弃这一努力。

索尔兹伯里 1886 年 6 月再度担任首相后,于次年 1 月派沃尔夫第二次赴君士坦丁堡。他在给女王的信中表述了此次沃尔夫使命的任务和目的:“解决埃及问题……作为沃尔夫在君士坦丁堡商谈的基础”,“长期占领埃及,不仅与我们的承诺相左,而且与法国、土耳其长久不和,并随时可能导致尖锐的冲突”<sup>⅞</sup>。索尔兹伯里所以这样讲,是由于他被埃及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他感到,英国占领埃及“阻碍了英国在世界其他地方实施自己政策”,他对德国的意图尤为警觉,2 月 23 日他在给沃尔夫的信中说,俾斯麦不断地告诉我们,“法国愿意以进攻埃及为代价与他和解,但他为英国拒绝了法国的提议,英国须为此给予回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尔兹伯里无奈地表示:“我真心希望我们从来没有进入埃及,如果我们没那样做,我们的手可以伸向全世界”。他还说:“只有埃及问题,使我们处于这样的困境。”<sup>⅝</sup>但索尔兹伯里依旧不想作出立即撤离埃及的承诺,而以英国继续在埃及滞留 5 年的提议替代,这算是比第一次谈判时

<sup>1</sup> 劳伦斯·麦克尔:《1870—1900 年英法在埃及的竞争》(Lawrence Michael, “The British and French Rivalry in Egypt, From 1870—1900”), 纽约州立大学硕士论文 1980 年,第 120—121 页。

<sup>④</sup> 阿斯拜尔:《1885—1892 年索尔兹伯里统治时期的英埃关系》(博士论文),第 43 页。

<sup>⑤</sup> 威克斯:《1885—1887 年英国外交政策中的埃及问题》(博士论文),第 79—80 页。

<sup>⅜</sup> 威克斯:《1885—1887 年英国外交政策中的埃及问题》(博士论文),第 67 页。

<sup>⅞</sup> 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书信集》第 4 卷,第 39 页。

<sup>⅝</sup> 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书信集》第 4 卷,第 37—43 页。

愿意多迈出的一步。索尔兹伯里这种既想解除埃及问题所带来的麻烦、又不愿为此付出代价的矛盾使第二次谈判获得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甚至索尔兹伯里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给英国驻埃及官员的信中写道:“目前,沃尔夫谈判没有什么前景,除非欧洲国家的实力分布发生变化。”<sup>1</sup>对于索尔兹伯里来说,只有一点是明确的,英国“既不能在法国逼迫下撤出埃及”,也不能在德国的挑唆下和法国“陷入为埃及争斗的局面”。为此,索尔兹伯里认为,与土耳其的谈判“必须是谨慎的、缓慢的,并且有一点含糊其辞的”<sup>④</sup>。笔者认为,第二次英土埃及问题谈判已带有拖延时间的色彩,因此时索尔兹伯里已开始和中欧意大利及奥匈接触,在英国的外交布局中,已酝酿着摆脱在欧洲的孤立、保护自己在中近东利益的下一个举措。

1887年5月22日,沃尔夫与土耳其缔结了协定。协定除坚持土耳其帝国在土埃关系中的统治地位、确定了埃及的领土范围以外,涉及到英国的部分最有意义。协定第4条规定:英国仍在埃及保留一定数量的军队以维持秩序;第5条宣称:此协定满3年后英国军队从埃及撤军,但随后又规定了撤军的条件:即埃及“内外的危险都不存在”<sup>⑤</sup>。协定并没有说明由谁判断决定这种危险是否存在,实际意味着由英国判断。另外,第5条还规定:当埃及的安全和秩序遭到破坏时,英国和土耳其的军队有重新进入埃及的权利。显而易见,英土协定为英国在埃及保留了重要的特权,但索尔兹伯里仍认为做出了很大让步,他说:“仅就我们在埃及的利益而言,最好再在埃及呆15年”,但英国的埃及利益“必须让位给我们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sup>1/4</sup>。

与索尔兹伯里的愿望相反,英土协定的公布引起了俄法的愤怒,他们认为,土耳其签订此协定“等于同意了土耳其帝国的分裂,默许了对柏林条约(指1878年柏林条约—笔者注)的废除”。他们威胁道,若土耳其政府批准此协定,“俄国将立即占领亚美尼亚,法国则派军队占叙利亚”<sup>1/2</sup>。法国的态度可想而知,俄国反映如此强烈与此时(1887年6月)正在签订的俄德《再保险条约》直接关联,有德国的支持,俄国对英国可以有恃无恐。俄法的威逼,使土耳其政府一再推迟对协定的批准,6月15日正式通知英国,土耳其不能批准此协定。沃尔夫再次空手而归。

### 三、两次埃及问题谈判的评价及影响

沃尔夫两次君士坦丁堡之行,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两次都以失败告终。笔者认为,沃尔夫使命的失败证明:索尔兹伯里在“不放弃英国利益的前提下,仅对埃及问题作口头上的、不能立即兑现的让步,以达到英国外交目的”的设想,根本无法实现。抛开沃尔夫使命的潜在意图,仅就埃及问题而言,索尔兹伯里试图把欧洲各大国排斥在外,英土单独协商解决的幻想由于各国的阻挠,也终成泡影。应该看到的是,两次谈判虽然都失败了,但对英国中近东政策和欧洲的同盟政治产生的重要影响。

第一,两次英土埃及问题谈判的失败在中近东历史上是个里程碑。首先,在中近东地区,

<sup>1</sup> 阿斯拜尔:《1885—1892年索尔兹伯里统治时期的英埃关系》(博士论文),第46页。

<sup>④</sup> 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书信集》第4卷,第41页。

<sup>⑤</sup> C. L. 史密斯:《威廉怀特先生在君士坦丁堡的使命,1886—1891年》(Colin L. Smith, *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 White at Constantinople, 1886—1891*),伦敦1957年版,第74—75页。

<sup>1/4</sup> 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书信集》第4卷,第43—45页。

<sup>1/2</sup> 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书信集》第4卷,第46页。

俄法第一次站在一起,共同阻止了两次谈判的成功。俄法的联合行动是沃尔夫使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而法俄的合作也是尔后法俄同盟形成的有意义的一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A. J. P. 泰勒曾评论道:“沃尔夫协议的失败是使法国人走上同俄国结盟道路的决定性因素。”<sup>①</sup>其次,英土关系进一步恶化。英土条约遭到拒绝一事,不仅仅在于协定本身,而在于英国“将来与土耳其的关系以及英国在东方的影响处于危险之中”<sup>②</sup>。正是鉴于以上两点,索尔兹伯里女儿在他父亲的传记里才这样总结:“英国与埃及都没有从索尔兹伯里的失败中直接遭到损失,它的重要性在于对欧洲历史进程的影响。”<sup>③</sup>换言之,两次谈判的失败对英国的中近东政策,乃至对欧洲国际关系的影响更为深远和重要。

第二,笔者认为,两次埃及问题谈判是英国寻求摆脱孤立的一种途径和尝试。这里值得注意和强调的是,作为 19 世纪晚期英国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索尔兹伯里并没有把赌注全部押在英土埃及谈判上,当他意识到沃尔夫的土耳其之行已不能达到所预想的“使英国摆脱孤立、并从土耳其那里得到回报”的目的时,已于 1886 年底和 1887 年初,着手与奥匈和意大利就地中海协定进行谈判。这些接触和谈判意味着,英国摆脱孤立、加强自己在地中海地区和海峡地区防御的双轨外交已经形成。也就是说,埃及问题谈判一旦失败,英国还有其他的补救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谈判失败最直接的结果:即结束了英国在与中欧国家联合问题上的犹豫和徘徊,加速了英国与奥意签定地中海协定的进程,而地中海协定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与欧洲国家签订的最具有同盟性质的协定。毫无疑问,两次埃及问题谈判是从属于 19 世纪晚期英国的欧洲同盟政策的。

第三,埃及问题谈判的失败是英国在埃及历史上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从表面上看,沃尔夫使命与 1885 年以前英国代表被派往埃及调查埃及状况没有什么区别,但正是这次使命的背后动机使其具有特殊的意义。沃尔夫使命虽然没有达到索尔兹伯里预想的目的,但在埃及问题上,实际上形成英国既不撤军、也不承诺确定撤军日期的局面。难怪英国驻埃及官员说,“沃尔夫谈判有许多益处”,“1885 年几乎没有人不赞成英国尽早从埃及撤离,1887 年这种让英国军队撤退的喧嚣渐渐平息”<sup>④</sup>。英土协定被欧洲大国否决,客观上使英国从埃及的撤军遥遥无期。据统计,从 1882 至 1922 年的 40 年中,英国政府从埃及撤军的诺言先后重复了 66 次之多,但一次也没有兑现。

第四,埃及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甚至“变成第二个印度”。但这不等于英国已经放弃了君士坦丁堡,不等于索尔兹伯里对英国在海峡地区抵抗俄国的能力失去信心。无论从沃尔夫使命的动机还是结局看,土耳其海峡依然在英国中近东外交战略中占重要位置。1887 年两次地中海协定的签订再次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应该肯定的是:埃及问题谈判虽是英国从孤立走向合作过程中的一次努力,却使埃及问题和英国对土耳其海峡的政策更紧密地连为一体,使英国的“欧洲均势”政策与“帝国防御”政策更紧密地连在一起,英国中近东的整体战略进一步趋于成熟。

[本文作者赵军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37]

(责任编辑:任灵兰)

<sup>①</sup>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1848—1918》,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356 页。

<sup>②</sup> C. L. 史密斯:《威廉怀特先生君士坦丁堡的使命, 1886—1891 年》,第 80 页。

<sup>③</sup> 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书信集》第 4 卷,第 50 页。

<sup>④</sup> 史密斯:《威廉怀特先生在君士坦丁堡的使命, 1886—1891》,第 81—82 页。



# **An Analysis of Anglo-Turkish Negotiations on the Egyptian Issue**

Zhao Junxiu

Anglo-Turkish negotiations on the Egyptian issue reflected the revision of the British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Anglo-Russian crisis in Central Asia in 1885. Salisbury, the British Premier, tried to advance the Egyptian issue to relax the tens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to free Britain from being isolated in Europe. Although the negotiations didn't realize the aim that Salisbury had expected, they were more important to British strategies in Near and Middle East. They were also important to the alliance politic in Europe in the later 19<sup>th</sup> century.

# **Feudal System and Slavery in Burmese History**

He Ping

Through the research done in depth, scholars have found that in the case of Burma, the first class society was not the so-called slavery society, but the feudal one. There had, however, existed a kind of slavery throughout the whole stage of feudal period. Judging from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slavery was a system existed along with the feudal system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in the ancient class society of Burma. Slavery and the feudal system were two systems co-exist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history of Burma. However, the feudal system had been the dominant one.